

doi:10.3969/j.issn.1674-117X.2020.06.001

实体与间性：危机传播的一种差异化尝试

——以央视频慢直播的疫情报道为考察对象

林克勤¹，陈文敏²

(1. 四川外国语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 重庆 400031; 2. 吉首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 湖南 吉首 416003)

摘要：在新冠疫情报道中，“国家队”央视频配合其他主流媒体发挥了探知真相、引导舆论、安抚民心的重要作用，其特殊时段、场景的“慢直播”以超越信息实体的仪式化叙事逻辑，锚定了“超级注意力”，在主体的悬置抽离、人机的共生认知、线上的游艺创生等方面呈现出“间性论”特质。在短视频+的风潮下，作为危机传播的一种差异化尝试，慢直播以长视频、大场景、无情节的反转式运作，超越了以往只针对谣言进行澄清的传统思维，是融媒传播对时空、关系、变化等非实体因素的一种综合把握与调适。其运用镜像映射、仪式观瞻、抽离速度的媒介手段建构了“全民战疫”的想象共同体，促发了有机体与媒介社会假体生态的融合共生，其间的精神交往也将唤醒公众对价值创造的反思。

关键词：新冠疫情；央视频慢直播；危机传播；间性论；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20)06-0001-08

引用格式：林克勤，陈文敏. 实体与间性：危机传播的一种差异化尝试：以央视频慢直播的疫情报道为考察对象[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5(6)：1-8.

Entity and Interology as a Differentiation Attempt of Crisis Communication: A Case Study on the COVID-19 Report by Slow Live Streaming of CCTV App

LIN Keqin¹, CHEN Wenmin²

(1.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31, China;
2.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Jishou University, Jishou Hunan 416003, China)

Abstract: In the reports of fighting COVID-19, CCTV app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of detecting truth, leading public opinion and consoling citizens with other mainstream media. At this special period, “slow live streaming” emerged some features of “Interology” in the field of subjectivity’s suspension, symbiosis cognition of human-machine, game and creation on line by ritualized narrative logic over information entity. In the tide of overwhelmed video clips, as a differentiation attempt of crisis communication, slow live streaming is a comprehensive confidence and adjustment on space and time, relations and changes by using long video, grand

收稿日期：2020-10-2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当代阐释与对外传播”(19XXW001)；湖南社科基金项目“‘视频转向’背景下主旋律新闻叙事的视觉传播力研究”

作者简介：林克勤(1966—)，男，重庆人，四川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认知传播学、文化话语；陈文敏(1972—)，女，湖南株洲人，吉首大学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广播电视、新媒体。

scene and plotless story in reversal way, which stand above the traditional thinking mode of clarifying rumors. These media measures of image mapping, ritual impression and fleeing from speeding-up constructed a "fighting Covid-19" community of imagination, and promoted the fusion and symbiosis of organism and prosthetic ecology in media society. The spirit intercourse on line in this period will arouse people's re-thinking on value creation.

Keywords: COVID-19; slow live streaming of CCTV app; crisis communication; interology; community

发端于2019年底至2020年初的新冠疫情给社会造成了重大冲击,在庚子年浮现的这起典型黑天鹅事件中,其信息传播渠道被认为经历了社交圈子传言→自媒体发声→地方官媒主体缺位→主流媒体专业化重磅报道→多种媒介共同配合、全方位报道等几个演化阶段^[1]。事实证明,这种危机传播的媒体发声模式一开始仍然是以澄清谣言、修复形象、安抚民心为核心的,仍然没有脱离传统的单一应对危机的宣传策略。充分运用了5G、AI等新技术的央视频等“国家队”另辟蹊径,采取了一种全新的视角介入对疫情的报道。自1月27日晚开通雷神山、火神山医院的建造过程直播和对武汉天河机场救援物资空中通道的直播以来,其吸引了数千万人夜以继日的“坚守围观”,累计同时在线人数超过4000万^[2]。这种与快鱼吃慢鱼、局部胜整体、讲究短平快的现代信息传播方式迥异的慢直播,激发了危机传播的一种创新突破与差异化尝试。在短视频成为媒介结构性生态的风潮之下,慢直播以对人类交往模式本质的回溯、反拨和调适,为危机传播实践改革和风险社会心理探讨提供了一个典型样本。

美国格兰谷州立大学商戈令教授近年来基于中国哲学的创新性发展提出了“间性论(interology)”概念,用来指称存在、实体、语词及概念组成之内、之外和之间的时空、变化、关系等非实体因素、性质和作用的总合^[2]。本文以间性论为理论立场,跳出以往注重实体和存在的认识论路径依赖,探寻慢直播这一特殊传播方式在主体的悬置抽离、人机的共生认知、线上的游艺创生等方面蕴含的种种间性关系,以及诸事物之间的生成、境况、态势、关系、相互作用、时位、变化、全体等的媒介融合态势,以期探问公共卫生事件中网络传受、社交的新维度和新影响。

一 传受主体的悬置:视观聚焦与思想巡游

传播主体历来呈现的是传播者、被呈现者(信息来源)与信息加工者(受众)诸要素之间相互掣肘的间性关系。传播是情绪、感受、知识、信息、能量、物质、符码在主体间传递的进程和活动,总体上看,有两大类:传播的传递观与传播的仪式观。前者看重功能主义传播效果,如信息的准确性、可靠性;后者强调通过信息共享达到对一个共同体的维系。显然,没有多少实际剧情、实在信息的慢直播本质上是一种仪式化传播,其接收端的视观聚焦是对仪式时空的过渡,也是一种思想上的陪伴、冥想与巡游。

(一) 镜像的映射:白描式再现中的视观

深刻影响了世界社会型构的西方哲学历来有镜式思维的传统,其认为决定着大脑中绝大多数理念、范畴的是图画而非命题,是隐喻而非陈述,认为“人之心”是“一面明净平匀的镜子,在其中,事物的光线应按其实际入射的角度来反射”^[4]。端于美国的客观主义新闻学承袭了两千多年来的西哲传统,形成了一种认知世界的镜式映射信息表达方式。在所有介质中,电视直播示现、再现、复现生活的镜像本质最为突出。慢直播以大场景、白描式、无主体为风格,不对用户施加主观影响和有意引导,其历史可追溯到2009年的挪威。当时,为了纪念卑尔根铁路诞生100周年,电视台全程跟拍了一趟火车在这条线路上的旅程。在跟拍列车行驶7个多小时的过程中,节目没有进行任何画外音引导和后期处理,却吸引了120多万挪威人观看。挪威“慢电视”节目创始人托马斯·海鲁姆曾在Ted演讲上总结说,这是“世界上最无聊的电视节目,却让人迷得无可救药”^[5]。

央视App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基于5G、4K、

AI 等新技术推出的国家级新媒体平台, 在新冠疫情报道阻击战中, 央视频的全方位、无死角、过程式报道赢得了公众的广泛认可, 体现了其作为国际级媒体的强大资讯统筹力和技术诠释力。有学者这样评价: “疫情紧迫使信息的新闻性增强, 但信息供给有限, 不确定性明显。慢直播所带来的自主参与体验, 在环境、流程、细节、语言甚至动作上使真实变得触手可及。”^[6] 试想, 在一个大型工地上, 众多工程车在嘈杂之中日夜作业, 无主持人、无解说词、无镜头切换、无后期剪接、无背景音乐, 只有固定机位、机器轰鸣、进展缓缓, 这画面冷静得犹如一个监控器的画面。在这样大远景或大全景的画面中, 没有剧情、表情……这 4000 多万人在直播间看什么? 他们的关注为何而来?

(二) 仪式化传受: 静态凝视中的共情

政治社会学奠基人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论述了传播与“共同体想象”的关系, 认为传媒能为公民提供共同参照、维护社群融合。美国文化学者詹姆斯·凯瑞在 20 世纪 80 年代提出“传播的仪式观”, 以弥补美国主流“传递观”劝服效果研究之不足, 表达了传播的文化指向。若以美国学者丹尼尔·戴扬和伊莱休·卡茨 1992 年提出的媒介事件的三种电视脚本——竞赛 (context)、征服 (conquest)、加冕 (coronation) 为讨论框架, 慢直播至少符合媒介事件之中竞赛和征服这两种意涵, 即, 这是一场“硬仗”, 我们“要赢”。由于疫情紧急, 临时医院要尽快建成。从各方基建队入场到医院建成, 这一时段可以视为“过渡仪式”, 类似于交通灯红灯停、绿灯行之间的“黄灯守候”这一仪式点。过渡仪式完成后, 工地就变成了医院, 事物的身份发生了质的变化。而修建期间, 受众的守候接力成了一种对仪式性事件的仪式性收视。央视频在武汉长江大桥、洪山广场、汉江关、会展中心、沙湖公园、武汉大学等多个标志区域架设直播镜头, 通过泛中心、分散化的技术装置 24 小时不间断地呈现武汉的“此时此刻”。这种马拉松式的慢程直播, 以无添加、白噪音、映射式报道, 反映了海德格尔“在世存在” (Being-in-the-world) 的认识论观点。在电影领域, “电影眼睛”理论、“纪录电影”“摄影机是叮在墙上的苍蝇”“旁观的美学”等理念都强调镜像功能。影视同源, 纪录片式的慢直播也

不太讲究光影调的造型、构图; 虽然放弃蒙太奇的戏剧性效果, 简单连接, 内容平实, 缺少动感, 但其恰恰通过对新闻现场凝固、静态的美感刻画, 在观众内心升腾起“武汉加油”的信仰力量与精神对话。

随着新媒体的普及, “远处的苦难”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 每当不可抗力的重大灾难发生时, 网民往往借用鲁迅的“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罗素的“对人类难以承受的苦难的同情”这类话语来表示对远方苦难的深切关注。在卢梭的政治哲学中, 同情是一种天然的美德, 是道德的基础之一。本雅明在《讲故事的人》中将故事及其讲述分成两种: 本乡本土的掌故、传统以及远方带回的域外传闻。电视这一“吟游诗人”便是讲述远方故事的绝佳代言, “受灾—赈灾”又是一种对苦难的仪式化过渡, 同情弱者、物伤其类、渡人渡己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疫情期间“呆在家里就是做贡献”的人们通过云监工在公共议题中找到存在感, 导向多难兴邦的共情、同情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凝聚, 而对国际疫情的报道视观, “更远方的苦难”则呼唤了一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图景擘画。

(三) 原地的逃逸: 速度崇拜的焦虑抽离

现代社会快节奏的生活造就了一种川流不息的提升逻辑 (promotion logic) 及其理论指引下的社会增长图景。一切以“量”和 GDP 模式作为类比标准, 更快、更高、更强成为普遍主义的线性思维方式, 程控装置控制一切, 各行各业力争上游、不甘人后、怕被社会抛弃。而“在晚期现代的‘加速社会’当中, ‘安逸的存在’并不能支撑人们的计划、梦想、价值、目标, 而不受到匮乏、失败、衰退的威胁。人们已经体验到加速的力量不再是一种解放的力量, 而是成为一种奴役人们的压力”^[1]。当代社会文化视域中的“速度”不是一个物理学矢量概念, 而是界定现代社会高速发展特征的整体性词汇, 承载积极、肯定性的价值和价值观。“快速”意味着效率、金钱、先进、合理和顺利, “慢速”则表示慵懒、贫穷、落后、失败和落伍, 在这种二元对立结构中, 速度的正面价值隐喻得以放大^[8]。由此造成的“速度崇拜”成为公众尊奉的金科玉律; 停不下来、浮躁焦虑、压力巨大甚至抑郁厌世, 则是工具理性对价值理

性的异化使然。电子媒体作为一种快感介质,其巨量复制和海啸式的生产方式传播着无数的空洞能指、虚假需要和炫耀性消费,以加速度逻辑演绎着震撼美学、眩晕美学,迎合并领跑现代社会高速发展的整体想象,在这个过程中,传统美学的静观默照和艺术灵韵消失了。“把一切娱乐都变成了滑稽剧……这种倾向在显著增加。”^[9]

作为有机体的人类如何突围这种程式化的加速度生活,如何摆脱焦虑控制,有所闲暇,并最终寻求自己的心灵救赎?德勒兹在《千高原》中提出了主体向客体转化的三种抽象路线概念:严格区分的克分子路线、轻快切割的分子路线和逃逸路线。克分子路线代表主体内在存在微观断裂,向未来展开;分子路线是正式分割,告别过去,发生蜕变的裂变;而逃逸路线是成为他者的最后环节,是摆脱主体的稳定状态,成为另一物^[10]。在控制社会中要实践这一逃逸政治,需要有一个以直觉和情感参与创造行动中的“艺术家和神秘主义者的灵魂”,还须在社会压制和理智对抗的两极逻辑中寻觅一种宰制装置的超越性力量,以实现“原地的逃逸”。大处而言,哲学、艺术、宗教、波西米亚风格等心灵路线可以抵达;小处而言,摄影、摄像、旅游、仪式等也在某种程度上能缓解身份焦虑。慢直播的走红正是这种精神欲望指涉的一种实践理路,它以对速度崇拜、视觉奇观的能动反拨,实现对传统慢生活的一种复魅,在现代都市中寻觅到一种异质时空,实现“诗意的栖居”,比如“把时光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慢直播呈现出与传统新闻报道求新求快、反常冲突、情节优先、人性为重相迥异的风格情致。这种相对较为枯燥、缓慢、展示过程的表达方式之所以被接纳,我们认为,这一行动有着深远的文化心理渊藪。

二 媒介假体的活跃:场景互嵌与人机融合

海德格尔在1955年的著名演讲《技术的追问》中主张,技术是一种展现的途径、一种解蔽(das Entbergen)的方式,一种让所有本质上的东西的自我揭示,是一种座架(Ge-stell)装置。新媒体技术是当前社会中介化最重要的知觉架座,对生活进行了深度的技术殖民。后大众传播时代,媒

体发展已从“实体交互”转向“场景互嵌”,从内容平台转向了关系平台,一旦“脱嵌”就会丧失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传播力、影响力。在风险社会中,针对公共卫生事件的报道,传统舆论阵地如何超越固有的探源、辟谣、怒怼等模式路径,创新危机传播方式,央视频等“头部媒体”根据自身的权力、体量、定位、平台和多年广泛的用户基础,给出了一份优良答卷。

(一) 媒介社会里的假体生态

媒体和信息传播之间的关系大致有四种:技术决定论、社会建构理论、社会形成论、技术驯化。麦克卢汉早就勾勒了技术决定论的现实图景,将大众媒介视为人体器官赋能后的扩展,“任何发明或技术都是人体的延伸或自我截除。”科学技术催生的诸多假体(prosthesis)和“义肢性技术”越来越多地成为日常应用,如望远镜、摄像机、助听器、起搏器、义肢、自动取款机、机器人、无人超市等,一个满足现代公众精致型生存需要的庞大假体生态呼之欲出。媒介技术领域内也是如此,信息传播和社会交往逐渐蜕变成人与技术的关系,或人凭借技术装置与其他人产生的一种假体嵌入影响下的互动。面对面交往的情景只在亲密关系中较多,更多的社会交流可能依靠假体运行。信息全球化、技术全球主义(Techno-globalism)使人们脱离了用身体感知世界的传统样态,一个高度媒介化的超便利时代已经来临。

由此可说,一个媒介假体生态环境正在逐渐生成,但注意力资源是分散的,头部媒体虽然有更好的用户吸附力,但也需要持续创新节目形式,使之与新媒体的触媒习惯相对接。在场景互嵌的时代如何当好“人体的延伸”,在央视频24小时的医院建造慢直播中,7个方位的摄像机发挥了视觉假体功能,为公众营造出了一个身临其境的拟态环境,为数千万的云监工用户搭起了空间交流的假体。在这个虚拟云端生态中,技术装置发挥了保持人类交往的重要作用。

(二) 时空连线中的媒介退隐

现代性造成了视觉的去地域化,麦肯齐表述为“时空压缩”,英尼斯称之为“时空偏向”,麦克卢汉命名为“地球村”,吉登斯判定为“时空分离”,梅罗维茨说是“消逝的地域”,等等,远距离事件、地方性场景和社会关系交织在了一

起。谭天认为,电视不仅是内容产品,也是形式产品、播出产品和时间产品。电视节目中的“时间”体现为五大要素:时长、时序、时段、时机和时效^[1]。法国修辞学家热拉尔·热奈特的时序理论提出,事件时间和叙事时间的关系可以精炼为非等时、概要、延伸、停顿、省略等几种类型。电视直播的事件时间和叙事时间几乎同步等长,即为“时间的复原”,同时也是空间的复原。电视直播是对原本不可见的事物的敞开,即将不可见的变为可见,使空间从一种黑暗状态走向透明状态、从模糊状态走向开放状态、从动物性状态走向社会性状态、从过渡状态走向自成体系的单元状态。

央视频 App 的慢直播反映了时空在线的社会交往生成过程,公众可以随意进出其内,传受之间合并成为一个连续交往行为的整体,呈现出信息即我、我即信息的一种双生共体关系。透过强大的假体生态,信息两端之间的差异、距离、事件、时空等都被一一克服,产生了一种立即再现的、透明化、去障碍化、中介化的效应。但这种“立即性”本身包含了一种吊诡:“传播即到达”即意味着传受之间路障、区隔的消除,即时性是以“解媒介化”(de-mediation)为前提的,即时交往的终幕化效果激发了社会活力,造就了一个环绕在人们周围的流动的精神家园,重构了传统意义上的社会文化形态。“时空连线”模糊了真实与虚拟的界限,其沉浸传播形成了现代社会信息标准的生活状态,又潜在预示了媒介的退隐和解媒介化的到来,从而促使本来游离于人体之外的媒介加速成为人类有机体的一部分,型构出一种新的器官集合。如此,个体犹如手机的一个挂件。这也就是说,我们在强调媒介赋能的同时,人类对媒介的使用则要求其消失于意识之外,进化为人类与世界之间毫无挂碍、信息透明的互达状态。

(三) 赛博格(cyborg)在场的视界融合

1956年,麦卡锡等人在美国达特茅斯学院召开的学术会议上首次提出“人工智能”概念,期望能造出超越人的智能机器;1983年,物理学家彼得·罗素提出了“全球脑(global brain)”概念,认为电信传播工具将人类社会连接成了全球网络;1994年,《连线》杂志主编凯文·凯利在《失控》

中设想了“人的机器化和机器的生命化”;2006年之后,人工智能算法在计算机视觉、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等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2013年,奥巴马政府宣布为期10年的大脑计划,欧盟也随即提出同样的计划。随着机器学习、5G、大数据算法的深度融合,“心物合一”的人机共同体将是互联网的价值核心,人与媒介部分功能的融合共生正在成为信息传播趋势。当前,视觉文本、视觉话语、视觉建制和视觉机器正在成为视觉文化研究的重心,法国哲学家保罗·维利里奥在新技术与图像新型逻辑的重要文集《视觉机器》一书中提出,知觉自动化是“视觉机器”(vision machine)和“合成视觉”(synthetic vision)的时代。当前“人机”组成的赛博格(Cyborg)等“义体人类”已经具有了“后人类视觉”(posthuman vision)的特征。“视界”的融合标志着人类对现实认知的加强,它可以帮助公众识别谎言、分析事物、筛选关键信息,更方便地预知风险、管控风险、促进决策优化。5G之后的万物互联也预示着“高技术、低生活”的“屏奴”依赖状况,正使传播陷入某种后现代的虚无主义。荷兰学者穆尔就称赛博空间为“身体的奥德赛之旅”,认为人机互嵌带来了另一种精神冒险。

面对突发事件,电视传播原有的复现机制、仪式机制、“长视频”机制已越来越不适应信息时代的传播。去中心化的电视发挥“嵌入机制”优势,才能“再中心化”。这需要我们把握视频传播的主业优势,并在融媒平台应用上创新拓境、赢得流量,保持强关系的连接。央视频 App 力争用泛文体、泛资讯、泛知识开创融合视界,其对疫情的全方位报道体现了新型主流媒体的技术力量。无论医院建造监工,还是全国各地驰援通道的开启,慢直播的信息直供有助于平息疫情恐慌、澄清不实传言、明确抗疫进程。那些熬更守夜紧盯屏幕的公众,通过摄像机注视事件现场,而没有意识到他们的主观化、在线化、完形化信息交流正在型塑人和媒介共生融合的间性关系。这是人与人、人与媒介的一场“共视”。

三 隔空对话的意义:关系距离与游艺创生

从传统的央视到新媒体的央视频,用户从凝

视、想象转为参与、互动、行动。在公共卫生事件中,基于共同情感的价值体验、相似立场的感知确认而形成的围观集聚,将会形成行动表达的共同体以及特定的价值文化心理。在短视频和“轻传播”盛行的时代,长视频如何在降低传播成本的同时,重新凝聚注意力之问题,受到了业界的高度重视。慢直播充分尊重即时体验、注意力分散的互联网思维,其试图在隔空对话中形成热点话题和集体记忆。

(一) 云端想象:从面对面到线连线

美国传播学者彼得斯在《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中纠结于人类交流中普遍存在的失败感,力图站在理解交流的中立视野下,为人们寻找一个自由交流、平等对话、相互理解的世界。他是立足于人类社会平稳运行的大背景下来探讨这个问题的。新冠疫情这样的小概率却又重大的事件的发生,使得人们在物理空间和社会关系上形成了很大的阻隔,“远方的故事”几乎完全来自媒体和网络,延滞了人们长期以来的传播基本规律(线下交流),线上交流得到了更多的应用——大家希望借此更及时地明确信息、交流情绪、寻找慰藉。

据各地卫健委上报的情况,新冠病毒的基本传播路径是人传人,即以人为载体从亲人朋友等紧密关系空间向工作单位、餐厅、商场、交通工具等公共关系空间扩散;如无阻碍,便以人传人、人传物、物传人、物传物的方式,由近及远地向周边扩展撒播,最后形成大面积的社会沦陷。这就提出了一个新的社会心理学命题:高风险社会中的传统高速率、快节奏、短距离、频流动、集中化的人际交往方式有没有重新检讨的必要?可否变更为实体与虚拟并重的融合性交往形态?在现实中,这种相互占有对方物理和情感空间的石榴籽型社区在基层社会治理方面有着先天的优势,即上下结合紧密,“政府吹哨,社区报到”,便于形成共同的社会利益基础、共同价值观基础、共同的思想意志基础,有助于涵养正气、凝聚人心^[12],但这也隐含着人与人之间的间性张力不够,阻挡风险的障碍缺乏等短板。因而,呼唤多样化的社区组织形式,消解人口过于集中的巨无霸城市,保持社交距离,创造一种“思想与流动世界(the world of flow)之间的块茎式联系”,可能是一种

应对策略^[13]。新冠疫情告诉我们,城市人口密度太大,人与人之间的间性张力不够,有可能会酿成生态灾难;预防重大公共危机事件发生,是国家综合治理课题的未来向度之一。

除了实体交往组织的嬗变,线上交往也显示出了它在风险社会中的合理性和可扩展性。在封城禁足的几十天里,慢直播的云端聚合成为网络一景,具有相似兴趣、偏好、时空吻合的人群形成了一个云部落,以人-机-人的转化模式开展广泛的社会交流,或传递信息,或发表评论,或相互鼓励,或情感分享。吃瓜群众赶来“打卡”“监工”,滋生出丰富多样的交往范式。慢直播并不提供太多的实际信息,但以亲眼目睹的方式来破除公共危机的“恐惧诉求”“见证神奇”,以“陪伴式的社交”来扩散正能量,坚定“全面抗疫”的必胜信念以及“武汉是一个英雄的城市”带来的持续感动,从而促发社会主义大家庭这一“想象的共同体”的形构。用户调研表明:由于不同人群对于信息的需求不同,应该有丰富多元的角色提供多种类型的信息服务,如媒介层次的大小、快信息与慢反思、硬知识和软情绪、接受与参与的主动等^[14]。在重大公共危机事件的报道中,头部媒体、腰部媒体和尾部媒体要共同组成一个共同体,以分层传播形成有机的媒体信息生态。央视频慢直播同其他媒体的信息播报、辟谣求真、知识传递区分开来,以一种巨大的静默力量主导了软性的情绪支援——对社会苦情、民间悲情的正向引导,对八方救援的热情点赞,对社会公众的情感动员等等。显然,其对新型主流媒体的视觉传播力的创新不无启发意义。

(二) 缺场共在:平复内心的自我交往

如前所述,“速度崇拜”“精英崇拜”“消费崇拜”“成功崇拜”使得现代人的生活容易处于焦虑、彷徨、紧张、冲动、社交恐惧的亚健康熵态之中,难以保持平静、沉稳、澄明的心态。这已成为普遍的社会问题。新冠疫情打乱了社会的常规运行节奏、加重了紧张情绪,人们被迫宅在家里,无事可为却又心意难安。这一方面可以解释为什么有几千万人呆在家里关注无画外音、无剪辑的慢直播现象,网友回答是“太无聊了”;另一方面,这一陪伴式的网络围观也引发了公众对于慢下来的生活该如何度过的主动思考。汉

娜·阿伦特根据古希腊的哲学传统, 把人的生活区分为积极的生活和沉思的生活。其中, 沉思的生活是形而上的, 它象征着积极生活触动的思考和映射, 是一种离群索居状态下个体内在的一种独特精神运行, 一种对于意义的沉思, 一种对于意欲的分析和一种对于判断的把握^[15]。阿伦特关于自我精神交往的理念为公众生活在疫情这一非常时期提供了恰切注脚。慢下来的生活节奏在一定程度上唤起了人们重新思考人生、潜心阅读的欲求, 这对于平复焦虑的社会情绪、避免过激的社会行为, 促进健康、理性的社会发展, 不失为一种积极性的支持。

在央视频的慢直播中, 有如下内容: “与疫情赛跑——近距离直击武汉雷神山医院建设现场”, “疫情保卫战: 陕西榆林化工满负荷生产”, “湖北黄冈: 见证春天到来的脚步”, 等等。“云守望: 见证此刻, 期待春暖花开”这一期的文字介绍十分简洁: “在武汉长江大桥上, 24 小时直击此刻的武汉, 平静、美丽! 祝福武汉, 加油武汉。”网友留下了许多生活化的简短留言: “百舸争流; 船好慢; 今天风大, 镜头有点抖; 车多起来了! 怎么这么晃? 希望不久武汉恢复以前的车水马龙; 鄙人有幸在上面走过四回; 一直在等船过桥; 英雄的武汉人民加油; 在这桥上打招呼, 全国人民都能看到吧……”等等。其实不会有人一直在线上长时间盯着看, 多数情况是盯一会就出去了, 但出入自由的“打卡”方式表明“我见证了”“我来过了”的仪式性。互联网的“异步性”特征使得网民以一种身体缺席的方式实现了共同观瞻, 慢直播以一种人力难及的耐心, 表明着一些比速度和信息更重要的事情: 一个共时共享的意义空间就此形成, 它像一双凝视的眼睛, 指向党和国家对民生的深切关怀, 以及多年后集体记忆中的一个重要基点。

(三) 交往衍化: 从游戏到创造

今天互联网的具身性智能致力于“交互”这一核心概念, 交互存在于行为体与外部环境之间的互动与演化之中。段永朝认为, “伙伴关系”的人机界面不但能极大改善交互体验, 更主要的是可能会改写“交互体验”的深层含义, 指向“意义的赋值”, 或者“群体价值的涌现”^[16]。新冠疫情期间, 网民宅家看够了各种影视剧, 创新了

多种生活娱乐方式, 也在对央视频慢直播的反馈中显示了自己的文化创造力, 使得传播反馈充满生机。在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战役中, 10 天 10 夜, 如何完成“不可能的任务”? 网民名之曰“中国力量”“中国速度”, 将迅速集结入场的上百台挖掘机称为“基建狂魔”, 将江苏企业称为“火神山雷神山背后的苏大强”。网友们给在场的各种机械和设施加上了人性化的绰号: “送高宗——高层吊车; 送灰宗——混凝土搅拌车; 小绿——绿色渣土车; 大黄(龙虾、长颈黄)——水泥泵车; 小黄——黄色挖掘机; 焊武帝——电焊工作组; 摄政王——摄像头。”有了绰号之后, 评论区就更热闹了, 不清楚的还以为在看历史剧呢。“小黄闭上了眼, 好, 休息宝贝, 一会儿继续努力。”“两只小黄黄。”“小橙在跟小黄装土吗?”“小黄走了吗?”“每个人都超辛苦, 感恩每个人。”“小黄小蓝, 挖土不难。”^[17]等等。拟人化的背后是网络话语的戏剧主义、萌文化的表征, 这种深夜的言语行为没有什么具体目的, 也不是“消费灾难”, 在轻松调侃、抖机灵的背后潜藏着一种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艺术化, 在游戏的表象背后, 创新成为间性交往中的终极目的。

美国当代文学批评家弗雷德里克·杰姆逊借鉴恩斯特·布洛赫在《希望的原则》中的研究, 区分了乌托邦蓝图(utopia program)和乌托邦冲动(utopia as impulse), 认为作为蓝图的乌托邦是发现新生活的系统努力, 比如革命和公社。乌托邦蓝图较少, 而乌托邦冲动在生活中却到处可见^[18]¹⁶⁷。乌托邦冲动体现在美、完整、理论和完美的事物上, 同时也反映了追求正义、信任和团结的渴望。安东尼·吉登斯的“乌托邦现实主义”也是这类理路的一种范畴构建。乌托邦冲动大量存在于网上的新闻组、邮件组、聊天室、会客厅、BBS 论坛、微博、微信和 B 站等平台中, 它有对现实的批判, 也是对美好世界的渴望。杨国斌认为, 人们想象中的网络社区的形象有三种: 第一组是广场、茶馆、咖啡店和集市, 关乎开放与自由; 第二组包括家庭及其成员, 这些形象强调社会性、团结、友谊、归属感和同志情意; 第三组是“江湖”形象^[18]¹⁷⁹。慢直播的平台最接近第二种类型, 如“黄冈遗爱湖实时信号”之中网民留言: “无论这个世界如何沧桑, 美好, 仍是拿来理解这个

世界最好的方式;湖面上波光粼粼;无人机在空中拍摄的风景就是好;等你车水马龙……”2020年的新冠疫情给一路狂奔的现代生活拉了急刹车,为紧绷的物质欲望按下了暂停键,为公众提供了一段被迫闲遐的反思时光。时间的悬置使得人们从线性加速中停顿下来,媒介则为消解线性时间的意识形态提供了聚合平台,那就是作为“我世代”的游戏化审美与创造性的生活方式。

现在不在,未来已来。新冠疫情对人类社会交往方式的影响是深远的,危机传播可能也会不断创新其内容与形式。面对公共卫生事件的频频发生,传统媒体和新型主流媒体如何抓牢内容平台和关系平台,在众声喧哗中谋大局、树共识,传递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打造统一思想、凝聚共识的重要抓手,亟待进一步理论化、体系化。当网络短视频改变了时代影像的“代议制”,成为UGC、OGC、PGC、MGC生产重要的流量池,吸引了数亿人的跟风与追捧的今天,央视频慢直播作为风险社会时期一种反其道而行之的特殊传播手段,在危机传播转型优化的路径上做出了一些有益尝试。

立足于间性论的思维框架,慢直播并不仅仅指代一种信息平台 and 媒介存在,更是各种关系、时空变化和意义重构的总合。它所主张的镜像式映射、仪式化观瞻、原地的逃逸,可能会引发现代社会交往方式的重大革命,即一种实体交往和虚拟交往并重的衍生与繁殖。从此,“交往在云端”不再只是一句谶语,而是线下传播路径的合理备用和未来趋向。从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看,媒介技术的更迭对于社会观念和行为变迁发生着日益重要的影响,因为“媒介域的新旧衔接或新旧交替的时刻,不仅仅是基于传播效率的功能创新,更是重新建构社会关系甚至国家-社会关系的路径依赖选项”^[19]。由央视频App慢直播发酵的这场交往革命,必然会唤起人们对于社区功能和阶层结构的再度反思,在强化社区控制、加固组织链接的同时,其内省化、茎块化、游牧化的潜在底蕴对创造性生活也能起到一定引领作用,成为现代交往嬗变或异化的一种基础义项。

(美国格兰谷州立大学张先广教授对此文亦有贡献,特致谢意)

参考文献:

- [1] 栾轶玫,张雅琦.新冠肺炎疫情报道中的信息呈现与媒体表现[J].新闻战线,2020(2):12-15.
- [2] 魏英杰.4000万人“慢直播”:看到希望,相信力量,释放情绪[N].钱江晚报,2020-01-30(1).
- [3] 张聪,张洁.从间性论看中国哲学创新性发展及应用[EB/OL].[2020-10-25].http://www.cssn.cn/zhx/zx_lgsf/201806/t20180629_4490985.shtml.
- [4] 理查德·罗蒂.哲学与自然之镜[M].李幼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55.
- [5] 佚名.4000万人在看的慢直播,究竟有什么魅力?[EB/OL].[2020-10-25].https://www.sohu.com/a/369631802_817267.
- [6] 佚名.火神山医院“慢直播”为何火了?[EB/OL].[2020-10-25].<http://media.people.com.cn/n1/2020/0204/c40606-31569470.html>.
- [7] 哈特穆特·罗萨.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理论批判大纲[M].郑作戡,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109-110.
- [8] 季水河,沈丽琴.消费景观与文化工业:时尚广告的速度崇拜批判[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7,46(4):152.
- [9] 戴维·贡克尔,保罗·泰勒.海德格尔论媒介[M].吴江,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9:182.
- [10] 宋涛.德勒兹“重复”美学思想研究[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7:212.
- [11] 谭天,刘海霞.论作为时间产品的电视节目[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2,34(2):78.
- [12] 陈汝东.“离散式社区”如何向“石榴籽型社会”转化[EB/OL].[2020-10-25].<http://www.rmlt.com.cn/2019/1021/559608.shtml>.
- [13] 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M].张志斌,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111.
- [14] 方可成.抗疫需要一个全方位的媒体信息生态系统[EB/OL].[2020-10-25].https://www.360kuai.com/pc/9982f7f54e0c1c96?cota=3&kuai_so=1&sign=360_57c3bbd1&refer_scene=so_1.
- [15] 浦永春.汉娜·阿伦特的哲学之思[J].浙江学刊,2005(6):60.
- [16] 段永朝,姜奇平.新物种起源:互联网的思想基石[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143.
- [17] 央视频.《疫情24小时·与疫情赛跑的中国速度》雷神山实时画面1:2020年01月30日[EB/OL].[2020-10-25].<https://m.yangshipin.cn/static/2020/c0126.html>.
- [18] 杨国斌.连线力:中国网民在行动[M].邓燕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 [19] 大卫·雷·格里芬.后现代精神[M].王成兵,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213.

责任编辑:黄声波